

有人從武漢地圖的四個角畫兩條對角線，發現兩條對角線的交叉點是位於武昌的積玉橋地區。這個區域緊靠長江東岸，區域中最著名的地方要算新中國成立三十二年後重修的黃鶴樓了。

如果從政治的角度考量，區域中的一條僻靜的小街，肯定比黃鶴樓重要很多倍。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中最優秀的分子在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幾乎都曾在這條小街上行走過，他們的腳步在悄悄地丈量著國家的未來。

小街南北走向，長不過六百米，寬不過十米。小街的東邊原有一湖，清朝時在此築堤，而堤靠近都府衙門，這條堤便叫都府堤。二十世紀初，這裡形成居民區，在它的西邊一點便是長江輪渡碼頭。二十世紀五〇年代武昌公園擴建，都府堤北段的民宅均被拆，沒有誰記得在一九二七年時這裡發生過什麼。但是，遠在北京的中南海裡，有一個人對這條叫「都府堤」的小街念念不忘，他就是僅用了二十二年便使中國天翻地覆的開國領袖毛澤東。

當他走出戰爭這種鬥爭形式，開始把目光投向了國家建設

後，便對武漢情有獨鍾。

一九五七年九月，毛澤東「沉沉一線穿南北」的願望已經實現，他站在新建成的長江大橋武昌橋頭堡憑欄眺望，在不遠處的東北方向便是都府堤街。他曾在那條街上行走了半年多，留下了太多太多讓他既興奮又不堪的記憶。

毛澤東沒有跟任何人說起這條街，也不知道這條街已變成了公園的一部分。又過了六年，一九六三年，毛澤東再次視察武漢。這一次，他終於忍不住告訴陪同的人：「武昌有個都府堤，楊開慧同志在那裡住過，是四十一號。」說話技巧高超的他並沒有提到自己。

面對領袖如此精準地說出了三十六年前他在激盪的武昌居住地，湖北的官員們有些不知所措，趕忙行動起來。三年後，武漢市在原地恢復了四十一號建築。但之後又去過武漢很多次的毛澤東，卻始終沒有重回這個令他懷念、給他溫暖又讓他沮喪的地方。

四十一號在都府堤街的最北邊，是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的籌備人員以農講所的名義租下的。這是一棟晚清舊式磚木結構的建築，坐東朝西，青磚黑瓦，天井的兩側排列著十多間房。毛澤東在這裡除了臥室，還有一間書房。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二日，他從長沙趕到武昌後發現，政治格局發生了變化。此時的武漢，雖距毛澤東上次來才過了兩個多月，但政治形勢大變，贛漢之爭一觸即發。從南昌逃回的鄧演達已成為武漢地區國民黨的實際主事人之一，其職務是：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兼國民

革命軍武漢行營主任、國民黨武漢政治分會委員、湖北省政務委員會主席。他喜歡將「這是一個矛盾」掛在嘴邊，周邊的人背後就叫他「矛盾先生」。

前一年九月，毛澤東發表的〈國民黨革命與農民運動〉文章在相當一部分國民黨官員中引起反響。一直對農民運動感興趣的鄧演達，在他領導的國民黨軍總政治部內專門設立了農民問題討論會。他指出：農民問題是本黨本軍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為此聘請了毛澤東、李達、惲代英等人為委員。

毛澤東此前決定辦的是「湘鄂贛農民運動講習所」。見形勢發生了變化，敏感地發覺把農講所擴大到全國的時機到了，便適時提出，原定的「湘鄂贛農民運動講習所」應該由國民黨中央直接辦理。

果然，這個提議得到鄧演達的全力支持，國民黨中央決定創辦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由鄧演達、毛澤東、陳克文三人擔任執行委員。身為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會委員的毛澤東出任主任委員，鄧演達出任政治部主任，陳克文出任訓導主任。這正是毛澤東在到達武昌視察政治動態後所想到的結果。

落實了眾多具體事務後，他坐下來給遠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寫信，報告此次湖南之行。他一直覺得不解，中共中央的農民工作機關為什麼設立在繁華的都市？他不願意坐在上海舒適的樓房裡辦農民的事兒。

毛澤東幾乎是一支接一支地吸著南洋兄弟菸草公司生產的小聯珠牌香菸，這種菸當時買一

包送一包。而左手夾菸、右手持筆的習慣伴隨了他一生。

書桌的右手邊是一只小銅墨盒，這是舊物，毛澤東總帶在身邊捨不得扔。每次寫作，往銅墨盒裡稍加一點水，用毛筆反覆蘸幾次，便可流利地書寫。楊開慧在身邊時，這些事都是她做。現在，獨自一人的毛澤東只能自己備好這些。

他先簡要報告了考察行程後，立刻開門見山地指出：「在各縣鄉所見所聞與在漢口、在長沙所見所聞幾乎全不同，始發現從前我們對農運政策處置上幾個頗大的錯誤點。」

接著，毛澤東列出了三個錯誤，這三個錯誤是他兩個月前在中共中央特別會議上無法反駁的。他所尊敬的黨領袖陳獨秀在會上做的政治報告中，專門批評了湖南農民運動，而身為中共中央農委書記的毛澤東當時因無法拿出事實數據，只好與大夥兒一起接受了陳獨秀的意見。經過這次三十二天的調查，掌握了許多第一手材料的毛澤東，對黨內批評農民運動的觀點愈發懷疑起來，許多「為什麼」在他腦海裡揮之不去。為什麼在批評我右傾的同時，他們卻在做更加右傾的事？為什麼他們自己只在上海，不願意下到農村調查，卻又對農運橫加指責？為什麼鮑羅廷等人看不到農民運動的偉大成果？為什麼我在黨內提出的土地問題得不到贊同，而在國民黨這邊卻受到支持？

毛澤東快速地運動手腕，心到筆到地書寫著：

錯誤一：社會各界都認為「農運糟得很」，而事實上是「農運好得很」。

錯誤二：社會各界說農運是「痞子運動」、「惰農運動」，而事實是「貧窮乃革命先鋒」。

錯誤三：黨內外都說農民協會破壞了聯合戰線，而事實是根本就不存在什麼聯合戰線。他堅決地寫道：「農民問題只是一個貧窮問題，而貧窮的問題有兩個，即資本問題與土地問題。這兩個都已經不是宣傳的問題，而是要立即實行的問題了。」

毛澤東強烈地感覺到黨中央對農民運動沒有付出代價，而是坐享其成。此刻的中國如果不進行疾風暴雨般的土地革命，所謂的大革命就可能功虧一簣。充滿自信的毛澤東清楚地看到了關於農民運動的各個方面，他堅信，改變中國必須從農村開始，因為中國的人員結構現實是：最龐大、最集中、最沉穩的社會群體就是農民。中國革命的主力只能產生於農民之中。

毛澤東分析：為什麼國共兩黨同時把矛頭指向了湖南農民？那是因為北伐軍主力以及大量的中下層軍官都來自湖南。當他們的家族或親戚的利益被農民傷害後，自然就要求對農運進行約束。這一點，毛澤東無法感受。他在六年前就要求弟弟毛澤民把家裡的田、屋、牛等分給農民了，要不然他家受的衝擊恐怕也無法避免。

還有，湖南的農民認為，北伐的勝利他們也有巨大貢獻。現在勝利了，自己的要求當然應該得到滿足。所以，北伐軍愈獲得勝利，農民運動就愈火爆。事實上，如果沒有湖南農運，唐生智是否會倒戈參加北伐並快速奪取湖南，這都不能肯定。

最重要的一點是，這場聲勢浩大的農民運動居然是自發的。且有國共兩黨組織的指導，蘇俄也在暗中出了銀子，但對運動本身沒起太大作用。現在的問題是，要用什麼樣的方法把共產黨變成農運這面大旗的旗杆，並馴服自發的農民運動這匹野馬？毛澤東似乎看清了方向，當下中

國如同一輛恣意奔騰的馬車，而要駕馭它，農民的暴力革命就是韁繩。必須說服中央明白這個道理，讓他們理解，農民才是發動革命的主要因素。

美國第十六任總統亞伯拉罕·林肯被人稱為「偉大的解放者」，他主持頒布的《解放黑人奴隸宣言》讓美國持續的南北戰爭加速了結束的進程。人們一直把林肯視為解放黑奴的主人，然而他自己卻說：「我之所以要解放黑奴和有色族裔，全是因為這樣能挽救聯邦。」

當時的美國，南方聯盟把北方政府軍打得節節敗退，甚至連首都華盛頓都險些被所謂的南方叛軍攻破。林肯敏銳地發現，要打贏這場戰爭，必須調動以黑奴為主的農民。一方面瓦解南方叛軍的戰鬥力，另一方面可大大加強北方政府軍的戰鬥力。解放黑奴滿足農民需要土地的迫切性，已不是人道或經濟問題，而是你死我活的政治軍事問題。所以林肯在一八六二年連發兩道法令，一道是《解放黑人奴隸宣言》，另一道是《宅地法》。

兩年後，林肯獲得總統連任。被共產黨無限崇拜的哲學家、經濟學家、革命理論家馬克思，曾為此給林肯發了賀信。說：「星條旗擔負著工人階級的命運。」當時，《共產黨宣言》已經發表了十六年。

或許毛澤東在一九二七年的春天裡，並不知道大洋彼岸半個多世紀前的政治事件，也沒看過林肯的著作，但他接下來所要做的事，卻與林肯當年所做的異曲同工。

給中央的信發出後，毛澤東開始寫《湖南農民運動調查報告》。雖然在給中央的信中說：

「三、四日內寫出一個報告」，實際上在信寄出後兩天，約一萬八千字的報告就寫完了。這部急就章的著作成為了毛澤東的思想經典，不朽地流傳下來。

在眾多史料中都有這樣的敘述：臨近分娩的楊開慧在二月下旬也住進了都府堤四十一號，隨她一起來的有毛澤東的兩個兒子和岳母向振熙，以及從長沙帶來的傭人陳玉英。楊開慧不僅要照顧孩子，還夜以繼日地根據毛澤東的寫作提綱進行整理、分類、查證農運資料，並把全部精力傾注於謄寫《報告》文稿的工作中。

眾所周知，每月下旬是指這個月二十日以後。按毛澤東的計畫，報告已經寫完。事實是，三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嚮導》在發表報告的部分章節時，註明為「二月十八日長沙通信」。有理由相信，《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這篇偉大的著作，是毛澤東獨自一人在都府堤四十一號完成的。他寫《報告》時，楊開慧還沒有在武昌出現。

然而，楊開慧在都府堤四十二號所做的工作不能否認，很可能她是為丈夫編寫農講所教材《中國佃農生活舉例》所做的整理、分類、查證、書寫工作。因為從二月十八日以後，毛澤東的社會工作驟然增多，會議不斷，根本沒有時間坐下來編排講義了。

動筆前，毛澤東已胸有成竹。他要在接下來的文章中，圍繞「無產階級革命」這個大命題，闡述舊社會反動政權的真正核心是以鄉村為基礎，而推翻反動政權的力量也在農村。只是農民的革命性現時還處在自然狀態，所以過火行為時有發生。他要給農民的力量下結論：如果沒有人去

領導，鄉村力量是不會單獨發揮政治作用的。

毛澤東強烈感覺到，此時無論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只要能從政治角度去引導農民，那麼農民革命的成功率就很可能百分之百。必須從鼓勵農民的暴力行動出發，繼而鼓勵他們奪取農村的政權。毛澤東為自己的發現感到興奮，如同「其強如大風之發於長谷，如好色者之性欲發動而尋其情人，絕無有能阻回之者，亦絕不可有阻回者。」

不知毛澤東當時是否知道西方的尼采？是否知道「強力意志」學說？反正他陶醉於農運的情感，與尼采一脈相承。他給這篇報告定下的基調是：運用手中的第一手材料和已掌握的二手資料，對湖南農民運動進行總結。目的只有一個，為自己此前關於農民運動的論述進行政治辯護。報告的讀者是黨內決策者，所以它不是一份學術報告，而是一篇檄文。他摒棄精確的數據和統計表格，忽略農民對革命對象的燒殺掠奪，只談農民的「革命性」。用積極樂觀的態度，抓住主題，把簡單的「去做什麼」引導到「應該做什麼」上。他認為，在這個過程中，宣傳動員比組織更重要。他同時感到，自己與陳獨秀等的分歧變得無法彌合了，他無法容忍農民要革命，黨的指導卻是不革命。

毛澤東決定用第一人稱的方式書寫，更顯權威性和真實性。落筆的第一個題目便是「農民問題的嚴重性」，用了四百多字敘述他在考察期間得到的總體印象，並提出了預言：「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

麼大的力量都將會抑制不住。他們將衝破一切束縛他們的網羅，朝著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

他同時給了革命的黨派、革命的同志三條出路：「站在他們的前頭領導他們呢？或站在他們後頭比手畫腳地批評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對面反對他們呢？」

然後毛澤東用了六大段文字，進一步闡述開篇提出的論點。在介紹了「打倒土豪劣紳，一切權力歸農會」後，搬出孫中山先生，他要拿孫先生的「革命」為農民運動佐證。「孫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農民在幾個月內做到了。這是四十年乃至幾千年未曾成就過的奇勳。」

於是，毛澤東得到這樣一個廣為人知的著名結論：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

毛澤東的筆下行雲流水，洋洋灑灑，做出的判斷總是與別人不一樣。他認為「有土豪」，他還認為革命的先鋒是那些赤貧——「踏爛皮鞋的，挾爛傘的，穿綠長褂子的，賭錢打牌」的所謂「痞子」。這些人雖然有缺點，「但是現在多數都變好了」；農民運動的「主要力量」，正是這些革命先鋒。

針對有人指責農會幹了許多壞事，毛澤東針鋒相對地用了一萬多字來描述農會幹的十四件大事，這是報告的核心，是他掌握能讓對手斃命的「事實武器」。在毛澤東眼裡，歸類總結的這

十四件大事無一不是有革命意義的，繼而他得出了另外一個結論：「說這些事不好的，我想，只有土豪劣紳們吧！」「嘴裡天天說『喚起民眾』，民眾真起來了又害怕得要死，這與葉公好龍有什麼兩樣？」

當他寫完最後一個字時，頓覺酣暢淋漓，太痛快了！他沒有想過這篇文章會帶來什麼樣的結果，他高興的是許多之前朦朧或不確定的東西，此刻卻似乎清晰了，也確定了。農民問題加上武裝問題在毛澤東的腦海裡開始變得有系統起來。他甚至再考慮，如果國共合作失敗，共產黨該向何方？當然，此時他還無法知道，這篇調查報告的發表，為他在半年後領導湘贛邊秋收暴動打下了理論基礎和群眾基礎。

儘管有人後來評價這個考察報告「完全是空想」，說湖南的農民根本沒有毛澤東說的那種熱情，那裡的農協和活動也是因為北伐軍在湘境的勝利才有所增加，湖南農民完全沒有戰略上的重要性，但這些評價絲毫沒有影響這個考察報告最終成為可以不斷複製的革命經典。

都府堤四十一號在二月下旬變得熱鬧起來。老的有毛澤東的岳母向振熙，小的有他兩個分別是五歲和三歲的兒子岸英、岸青。白天繁忙的毛澤東，到了晚上享受著天倫之樂，教孩子寫字，給他們講故事。

他們家的佣人陳玉英，因為夫家姓孫，所以毛澤東、楊開慧都叫她「孫嫂」。第一次見到她的時候，毛澤東還開玩笑說：「孫嫂滿解放嘛，頭髮也剪了，還是一雙大腳板，和開慧一樣。」

一口湖南寧鄉話的陳玉英到武漢後被大城市搞暈了，她根本無法聽懂武漢話，出門買菜常找不到回家的路。毛澤東聽了哈哈大笑，說：「孫嫂，我有個辦法，可以讓你從今以後都不會找不到家。」他找來一個布條，用毛筆在上面寫上：「武昌都府堤四十一號陳玉英」，遞給陳玉英說：「孫嫂，以後再找不到，就給旁人看看這上面的字，人家就會給你指路了。」

毛澤東和楊開慧怎麼也沒想到，這個陳玉英之前的東家居然是一九二五年密令湘潭縣團防局抓捕毛澤東的湖南省長趙恆惕。一九二六年底，趙恆惕下台辭了僱人，陳玉英這才經人介紹，來到一直被趙恆惕追殺的毛澤東家做僱人。

楊開慧雖出身書香名門，但受丈夫的影響，對地位低下的窮人充滿同情，她只知道陳玉英是熟手，卻沒問過她曾經在誰家做過僱人。因為信任，都府堤四十一號的大小家務都交給了這個月薪五元的陳玉英。她自己更多的時候是把毛澤東需要的材料，工整地抄寫在一張張有著紅線條的十行紙上。楊開慧認為，這不僅僅是為丈夫的事業而工作，更多的是把自已的一切都獻給丈夫。

夜晚，毛澤東給岸英、岸青講《三字經》的故事，如「幼不為，老何為」、「融四歲，能讓梨」等。五年後的這個季節，因黨內發生巨變，他這兩個兒子變成了流浪兒，在十里洋場的上海流浪。大兒子岸英甚至試圖把爸爸教的故事講給路人聽，以換取養活自己和弟弟的銅板。

楊開慧看看丈夫與兒子在一起嬉笑，一股溫情油然而生，她摸著自己的肚子喃喃自語：「快出來吧，跟兩個哥哥一起玩，跟爸爸一起玩。」

這些天一有空，毛澤東就問她：「是個男仔還是個女娃兒？」楊開慧只能笑著說：「我怎

麼知道！你喜歡男孩子還是女娃兒？」毛澤東特別認真地說：「生小女娃兒好，跟你一樣漂亮。」楊開慧搖搖頭說：「還是生男孩子好。男孩子長大了可以跟爸爸一起革命。」「哈！」毛澤東發出爽朗的笑聲。

這時的楊開慧雖然知道丈夫雙手指上有十個夢，但她卻不知道在丈夫的下巴左邊，將會有顆預示著「中年得志」的福痣橫空出世。

毛澤東把考察報告寄給上海中央的同時，也給中共湖南省委寄了一份。然後，全身心地投入到農講所的籌備之中。

從各地請來的老師陸續到了，其中有在廣東海陸豐地區試驗農民運動，建立中國第一個農會的彭湃；有湖南老鄉夏明翰等，這個小夏加入共產黨還是毛澤東介紹的。他們都入住都堤府四十一號。這裡成爲一個熱鬧的大家庭。

此時，在武漢生活是比較愜意的。物價平穩，在漢口買大米一百斤是七塊半左右，一百斤煤球一元左右，一斤豬肉○：二五元左右，一斤煤油○：一元左右，買一兩金子六十五元（而在上海則只要三十七元）。在武漢的旅館下榻，包住包早餐一個月只需三塊銀元。

武漢一般工人的月平均工資是十五元，而紡織女工則可達到二十元。武漢政府在年初，還將小學教師的月薪增至二十塊銀元以上。一塊銀元可兌換兩百六十個左右的銅板，而去茶館喝一次茶大約八個銅板。

不知毛澤東在武漢時期的薪水是多少，但他在一九二四年時，就已領取國民黨候補中央委員一百二十大洋的月薪，這是他一九一八年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時領取薪水的十五倍。此時的毛澤東不僅在國民黨內擔任職務，還是共產黨的中央農委書記，薪水庫應該不會少。

毛澤東在花錢上到死都保持著農民的本性，除了好菸、好一口紅燒肉外，對穿著極不講究。身為高級官員的他，只有兩件汗衫、一件白襯衣、一件灰布長衫。不知是什麼原因，他排斥西服領帶，而當時的國共兩黨的同事們絕大多數都是西裝革履，風流倜儻。

毛澤東常常只穿件汗衫，抽著菸，在四十一號的天井中與夏明翰用家鄉話聊局勢、聊農運、聊經濟。毛澤東認為，北伐取得決定性勝利，完成了總的戰略目標的大部分，孫傳芳完了，吳佩孚快完了。如果馮玉祥願意加入北伐的話，奉系張作霖的日子也不會好過。但這些勝利似乎離共產黨愈來愈遠，如果再不抓住農民，不進行土地革命。試問，共產黨的前途在哪裡？共產國際的那些毛子們一手遮天，可是他們對中國廣大的農村知之甚少啊！

夏明翰告訴毛澤東，他的老朋友蔡和森馬上要從莫斯科回來了。而蔡的前妻向警予也要來武漢工作。

對蔡和森與向警予的分手，毛澤東是敏感的，當年他們一起在長沙組織新民學會的情景歷歷在目。一九二〇年，毛澤東得知蔡向兩人在法國結婚後，十分讚賞他們自由戀愛的行為，稱讚這是一個很好的先例。後來他自己展開對楊開慧的追求，也多少是受了蔡和森的影響。如今同仁們稱之為「向蔡同盟」的婚姻散了，毛澤東自言自語道：「也不知潤寰（蔡和森）身體怎麼樣了？

還是不是咳得厲害？那個彭述之怎麼會與向警予分手，又同羅亦農的女友結婚呢？」

夏明翰說：「聽說潤寰也與立三兄的堂客李一純結婚了。」

毛澤東猛吸幾口菸，從家庭問題上想起一直崇拜的領袖陳獨秀。他先娶高曉嵐，後又與小姨子高曼君同居，還忙裡偷閒穿過紫禁城去逛京城的八大胡同。面對高曼君「無恥之徒」的指責，他反譏這位與他同居的女人為「資本主義」，只想壟斷他。不知此刻，又有哪位女性被老頭子（陳獨秀）發展成生活伴侶了。

想到這兒，毛澤東苦笑著說：「李一純原來是開慧的嫂嫂。後來不知怎麼嫁給了李隆郅（李立三）。」

夏明翰笑著說：「當年你用二十八畫生的筆名徵友時，立三兄是其中的應徵者。」

「有三個半回音。」毛澤東回憶道，「李隆郅沒有明確表達他的意見，只能算半個。雖然後來一起搞安源礦工運動，但和他的友誼始終沒發展起來呀。」

彭湃是廣東海豐人，無法聽懂兩位湖南人的對話，便要求他們用彼此都能基本聽懂的語言交流。聽著彭湃滿口鳥語似的話語，毛澤東與夏明翰哈哈大笑。

彭湃曾就讀過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對國內經濟狀況有比較多的了解。他告訴毛澤東等，就世界範圍看，現今中國的國家財富已達六百億，排在美英兩國之後，列第三。而俄國才五百二十億，排在第七。

毛澤東說道：「戰爭是需要金錢的。從武昌首義到北伐，十五年了中國從來沒有平靜過，

支撐戰爭的重要指標就是經濟。當兵沒有糧可吃，戰爭就打不起來。遺憾啊，六百億財富不知在誰的手上？」

彭湃感慨地說：「軍閥混戰，軍費徒耗，民窮財盡啊。」

毛澤東笑著對彭湃說：「如果中國的財主們都像漢育（彭湃）你一樣，散盡良田，燒毀地契，那我們的農民運動就無需搞了。」

彭湃說：「潤之兄不是也把家裡的田地都分了？」

「不能跟你比呀，我家才二十多畝地。」毛澤東擺擺手。他話鋒一轉說：「不過，我的兩個弟弟都很支持啊，他們都心甘情願為革命貢獻。」毛澤東知道彭湃的大哥罵彭湃為「逆子」，恨不得殺了他。

夏明翰插話說：「潤蓮兄把漢口的長江書店辦得有聲有色，《嚮導》週刊的發行量聽說大增。」

毛澤東對弟弟毛澤民是很讚賞的。他從一個不識字的韶山沖農民，到現在的中共中央出版發行部經理，真是不易。據說他已把報刊分銷處開到香港、巴黎等地去了。《嚮導》週刊的發行量已從一千多份發展到了八萬多份。毛澤東知道弟弟的甘苦，他除了有精明的頭腦外，再就是能吃苦做實事。全國二十多個分銷處，都是他一個一個跑下來的。這次在漢口設立長江書店，從解決書源到調運書刊，他都親力親為。想到這兒，毛澤東用讚賞的口吻說：「潤蓮不易呀，文化冒有多少，卻把文化工作做得風生水起。」

毛澤東是職業革命者。隨著革命對象的變化，深知打虎尚需親兄弟的他，對兩個弟弟的安排也在變化著。大弟弟毛澤民精於算帳，對人寬懷大度。兄弟三個，頭尾兩個在外讀書，他卻沒有怨言，一直拿錢供大哥和小弟；小弟弟毛澤覃十三歲到長沙一師附小學習後，就一直跟著毛澤東，成績很好，又聰明，因為長期跟著大哥，對革命耳濡目染。為了培養他，毛澤東特意把他帶到廣州，進了黃埔軍校政治部工作。

現在，毛澤東對革命的認識有了更深層的理解。如何在現階段的中國搞革命？他從理論著手，開始形成自己的思想，這次寫考察報告，就把這種思想融入進去了。他還清楚地認識到，無論何種政治革命，若離開了武裝的隊伍和金錢，便是註定要失敗的。而自己的兩個弟弟完全可以從軍隊和經濟方向發展，有朝一日可以給革命插上兩隻堅實的翅膀。這對翅膀，對以書生居多的中國共產黨人來講尤為重要。

從二月十八日到三月二日，毛澤東在鄧演達的邀請下，三次過江去參加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召開的農民問題討論會，還出席了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毛澤東逢會必闡述自己對農民運動的看法和主張。他堅持認為「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暴力」的本質就是非理性的；不打爛舊的世界就不可能建立新的世界，所以農民一切所謂「過分」、「糟得很」的做法都值得去鼓勵。農民已經自發地組織起來了，現在只缺乏站在更高的高度去領

導他們的人。對共產黨來說，沒有比這更好的機會了。

雖然鮑羅廷、張國燾等人看到了國共分家的時間可能會提早，中共也已修改了政策：趨於反蔣。但是，沒有誰知道應該如何反蔣擁汪。反蔣在毛澤東的眼裡不過是「看上去挺美」的事。

對於汪精衛這個老上級，毛澤東看得明明白白。當年梁啟超說汪精衛等革命黨人是「遠距離革命家」，真是一針見血。此人雖一時激動從東京跑回北京，刺殺攝政王、宣統帝的生父載灃，可那不過是一個書生的一時衝動。如果他是個理性的人，是個懂得革命的人，為什麼孫中山不指定他為接班人？他是孫中山的政治遺囑起草人，可那個遺囑並非是孫先生自己提出要立的，亦沒有對汪精衛寫的話添改一個字，這是為什麼？而且，從一九二六年的「中山艦事件」就完全可以看出汪精衛的軟弱。身為國民政府主席又是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汪精衛，面對不過是中央執行委員的蔣介石，居然束手無策。事變後的第四天，竟召開臨時中央政治會議說：「我是革命政府和黨的代表，這件事我也有責任。我只責己不責人，一切均由我不能盡職所造成，我將引咎辭職。此事一切善後工作，均由蔣去辦。」

正是汪精衛的拱手相讓，才造成今日之國共合作陷入尷尬。而如今又想利用他來制約蔣，可現在的蔣介石絕非半年多以前的蔣介石。握有幾十萬雄兵的他，已嚐到縱橫天下的甜頭，豈是幾個書生能撼動得了的？

這個階段毛澤東的頭銜不少，卻都是虛職，無法影響到政策的制定。他只得不斷參加各種大會，爭取露面機會。但武漢政府的國共兩黨聯席會議，他無資格參加。

由陳獨秀、彭述之等把持的中共中央還遠在上海，遙控武漢共產黨的工作。

而武漢國民政府由徐謙、鄧演達等把持，加上蘇俄顧問的實際參與，又有兩湖的中共省委在做些獨立於中央的工作，可謂一團亂麻。身在長江邊的毛澤東常常想起潮水邊的屈原，也會情不自禁地用他那濃濃的鄉音吟誦屈大夫的楚辭：「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愁其相接。」「外承歡之汨約兮，諶荏弱而難持。忠湛湛而願進兮，妒被離而郢之……」

跟在鮑羅廷屁股後面的張國燾在一次會上曾質問毛澤東：所謂「有土皆豪」，難道有一小塊土地的自耕農民也算是「豪」嗎？你毛澤東算得上是湖南的一位紳士，難道也「劣」嗎？為什麼農運必須「矯枉過正」？要過多少？是暫時「過正」還是永久「過正」？

對於這些細節，毛澤東並沒有過多考慮，他想的是宏觀問題，是歷史給予的機遇。張國燾與陳獨秀多次指責湖南的農運，說過左了，會出亂子。卻不知這個亂子愈大，對黨便愈有利。但面對黨內職務遠高於自己的張國燾之質問，毛澤東「哈哈」大笑一陣，說：「政治口號往往是一時的，是根據當時實際情況制定的。」

所幸，他遇見了武漢的實權掌握者：鄧演達，多年後還無限感慨地回憶：「大革命時代做農運，陳獨秀、彭述之不同我合作，唯鄧演達肯同我合作。」

比毛澤東小兩歲的鄧演達，此時已與蔣介石發生衝突。作為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主任，深受蔣介石的信任和重用，但在北伐與遷都問題上，兩人意見不一。蔣介石想把鄧軟禁在南昌，結果鄧化裝脫險回到武漢。到了二、三月間，他成為武漢政府的領導核心。

鄧演達的農運思想與毛澤東一拍即合，不僅邀請毛澤東參加總政治部農民問題討論會，還邀請其在討論會上作《中國各地農民運動狀況》的報告，更重要的是，把即將開學的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交給毛澤東實際管理。這讓毛澤東有了一塊自己說了算的陣地。

與鄧演達短短幾個月的合作，給毛澤東在工作上、思想上打下了厚實的基礎。

武昌紅巷十三號是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所在地，這裡與毛澤東居住的都府堤正好是丁字形，從都府堤四十一號出口右拐再左拐，向北走約三百多米，便是紅巷十三號。

找到這麼個地方辦農講所實屬不易。此刻的武漢，中央機關林立，房子非常難找。想找一處能安排幾百人以上課、住宿的地方更是困難。先是選定了省立第一小學第三部，後又選定武昌縣孔廟，但都不合適，最後確定選擇位於紅巷十三號的湖北高級商業學校為所址。這裡曾是清末湖廣總督張之洞興辦的高等小學學堂，占地一萬兩千平方米。

毛澤東很滿意這個地方，尤其喜歡四棟房子之間有個大操場。在廣東辦第六屆農講所時，毛澤東就強調學員的軍事訓練，所以這次他要求在「規約」上註明：「為將來發展農民武裝起見，所以要受嚴格的軍事訓練。」還特別指出：「不受嚴格的軍事訓練，便是對革命沒有誠意。」並在「規約」的封面印著：「打倒封建思想，絕對服從紀律」。毛澤東要求，每天安排兩個小時訓練，每週搞一次野外軍訓。他指著大操場對教務主任周以栗說：「這個操場好哇，學員可以在這裡既學到農運的知識，又可以通過軍事訓練，學到軍事知識。這樣的人才是全國農民運動需要的

人才呀！」

周以栗也是湖南人，操著長沙口音說：「招生很熱門啊，有八百餘人被錄取。現在已有好多學員都到了。」

毛澤東問：「都有哪裡的？」

「江西、江蘇、河南、河北，還有東三省的，以及湖北的。」

「已經到了多少人？」毛澤東再問。

周以栗答到：「三百多。這幾天還在陸續報到。」

毛澤東思考了一下，說道：「我們原定是四月四日開學。可這會讓學員們等待將近三十天的時間，恐怕不妥。」

周以栗問：「能不能提前開學？」

毛澤東說：「那也不妥，開學的日子是擇生（鄧演達）兄定的，最好不改。他可不希望有矛盾哦。但我的意見是可以提前開課，這樣利大於弊。」

周以栗點頭說：「好主意。我去向鄧主任他們報告。」

一九二七年三月七日，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正式開課，有四百多名學員參加了學習。隨後每天都有各地學員進入講習所。據統計，這屆學員來自國內十七個省，最高峰時多達七百三十九人。

農講所設二十八門課，共分四個班學習，三個班在本所，一個班是特別訓練班，設在花園山。

毛澤東負責講授「農民問題」和「農村教育」。他的課通俗生動，引人入勝。他對農村根本性的問題——土地問題進行了革命性的解釋，一針見血地指出：解決土地問題的中心問題，便是要不要沒收土地的問題。毛澤東運用大量實例，搭配幽默風趣的語言，努力澄清混亂的思想。

他一如既往地給學員灌輸自己有了雛形的思想，比如「有土皆豪」。只有「打土豪」才能「分田地」，這其實是政治與經濟的關係。堅持「矯枉必須過正」，他用粉筆在黑板上畫一根向右彎的桿子，再畫了一根向左彎的桿子，中間畫一條直線。指著直線說：「如果要把向右的桿子弄直，就必須先向左邊狠狠地扳幾下，這樣它就直了。如果只把右邊彎的桿子扳到直線這裡，它永遠也直不了。這就是『矯枉必須過正』的道理。」

毛澤東基本是早出晚歸。這期農講所總時間是三個月，毛澤東上二十五堂課，是任課教師中最多的。

楊開慧則抓緊時間把他在考察湖南農民運動時對佃農的調查整理出來，毛澤東要對這些材料進行彙編，完成《中國佃農生活實例》講義，並印發給學員作為學習資料。

此時的毛澤東雖然內心總在矛盾著，但工作卻非常充實，家庭生活也穩定。

在農講所開課的前兩天，中共湖南區委的機關刊物《戰士》週刊第三十五、三十六期合刊開始連載他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他順勢在農講所講授這個報告，反響強烈。

這時，他收到參加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的正式通知。對這次會議早有耳聞，並做了準備，他有強烈的預感，會議可能讓蔣介石離武漢政府愈來愈遠。他並不清楚這種疏遠是利？還是不

利？但他有個堅強的信念：北伐革命的成功不能離開土地革命，這是取得勝利的根本保障。

中央農民運動講習開課後的第三天，毛澤東過江出席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提案審查會議，這也是一次預備會議。

在毛澤東二月十二日到達武昌的當天，中共中央就向黨內同志發出了通告：現時武漢（即）（國民黨）中央政府聯席會議諸人，以徐謙為領袖，堅決反對國民政府移南昌，反對蔣之個人獨裁。他們預備在三月一日前先在武漢召集一中央全會，以免蔣先發制人。

通告分析了當前形勢，指出：

「漢口的會議右派分子一定不肯來參加的，我們務須盡量幫助左派，使這個漢口會議能夠開成。」

通告同時要求：「凡是我們同志為『之』中央執行委員或候補委員、中央監察委員或候補委員，均須前往出席。」

通告還具體指出了要注意的細節：「惟各地宣傳時須十分注意：一，只能在口頭上宣傳（倒蔣）；二，不能在文字上明提蔣介石的名字，而只是依據以上事實，用巧妙的詞句暗射反蔣。」

看完這個通告，毛澤東心中酸酸的。鮑羅廷在武漢操縱一切，一邊自稱是「中國共產黨的保姆」，一邊又是國民黨的顧問，手上還掌握著共產國際撥給中國革命的資金。他住著電梯房，儼然是個太上皇。毛澤東知道，此刻還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其實也是鮑羅廷在遙控，估計這個通告

亦是他的主意。他想擁汪反蔣，可又不敢徹底揚棄蔣。他依靠唐生智，拉攏張發奎，甚至收買桂系將領李宗仁，可為什麼還不敢把事做絕呢？在毛澤東心中，大鬍子鮑羅廷是不可靠的，因為他並不了解中國這個靠道德維繫的國家。

作為共產黨人，首先要服從紀律。儘管毛澤東內心疑慮重重，也為自己人輕言微而苦惱，但在大是大非面前，他旗幟鮮明地與黨站在一邊。在七日召開的預備會議上，譚延闓等入主張會議延期，因為蔣介石答應三月十二日來武漢。但參加的九名共產黨人一致以會議已多次拖延為由，堅持如期召開。毛澤東還提議：

大會期間，政治委員會會議停止開會，如有重事故發生由主席團全權辦理。這個提議得到了通過。

在提案審查會議上，倒蔣的態勢已經明朗。實行黨的民主、限制軍事領袖權力等的提案，確定了這次會議的走向。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日上午，毛澤東做好了一切準備，過江去漢口南洋大樓出席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

從一月一日起，國民政府由廣州遷到武漢，應業主簡氏兄弟的主動邀請，進入南洋大樓這座五層大樓辦公，黨政臨時聯席會議也設在這裡。

南洋大樓是由華僑簡氏兄弟投資興建的，一九二一年竣工。整座大樓占地面積約一千平方

米。大樓坪台上有一尖頂，兩邊各有一圓頂，為漢口的西式樓房之一，是南洋菸草公司在武漢的倉庫和營銷中心。

當毛澤東走進這座灰色建築的三樓大廳時，參加會議的代表也都到了。他與鄧演達交談，交流了中央農民講習所的開課情況。鄧演達工作太多無法分身，是由毛澤東在主持講習所的大小事。

環顧四周，首先獲得的強烈感受是代表太少。應到會議的人總數為九十人（含候補監委），實際只到了三十三人。這是極不正常的，甚至是違法的會議。

但是，會議召開的理由是充分的。在會議的文件中寫道：「按照黨章規定，中央全合每三個月召開一次。自去年五月十七日召開後，除臨時全體會議以及中央各省區聯繫會議各開一次會議外，至今始未開會。」於是造成了「只見個人意志，不見黨的意志；只有個人自由，不見黨的自由」。大會認為：「蓋去年三月二十日武力蹂躪黨權、政權以後，不但總理之聯俄容共之政策被破壞，開個人獨裁之漸……」基於以上幾點，這次會議是非開不可的。

會議選出譚延闓、宋慶齡、徐謙、孫科、顧孟餘等五人為主席團。而徐謙和譚延闓表面看形成兩個陣營：一個反蔣、一個擁蔣。但會議的實際掌控者是鮑羅廷。

會議從第一天起就開始圍攻蔣介石的所作所為。黃埔軍校武漢分校政治總教官、中共黨員惲代英在會上沒給譚延闓等人一點面子，他提議將蔣介石把持的軍人部裁撤；提議嚴肅處理贛州工會委員長陳贊賢被殺案；提議改進廣東省黨部；提議嚴懲新陽農協被商會迫害案。

在惲代英等中共黨員的輪番發言下，會議始終保持反蔣的方向，這也是鮑羅廷最得意的地方。從去年年底起，國民黨內的會議幾乎被共產黨包辦了。陳獨秀也曾得意地說：「如今無論何事，左派均先問C.P.意見，C.P.不表態，便不敢做。」

當會議進行到第三天時，中共中央給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發來專函，斥責蔣介石公開揚言制裁共產黨，質疑國民黨中央為何不明確制裁蔣介石的言行？這份專函給本來就開了鍋的會議又加一把火，推動了一系列針對蔣介石個人的決議案被通過。

陳果夫和李烈鈞見情況已完全朝不利於蔣介石的一邊倒，便退出了會議。會議進行了七天，毛澤東參加了六天的會。因為到會的中央執行委員不達法定人數，甚至連表決都成問題，所以毛澤東等候補執委被遞補有表決權，這是毛澤東第一次在如此重要的會上有表決權，也是第一次感受到國共雙方間的針鋒相對。

而會議開幕當天，位於武昌兩湖書院的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就發生了支持蔣介石的「三一〇」事件。惲代英在分校主任鄧演達的支持下，將鬧事的學生嚴肅處理，近百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處分。重的開除黨籍，交中央嚴辦；輕的嚴重警告，並罰看總理遺囑。軍校教育部長張治中、政治部主任周佛海被撤職。曾參加過中共一大後退出共產黨的陳公博對這個事件有如此描述：「武漢軍校幾乎全籠罩在共產黨的氛圍，不接近共產黨的學生已經逐漸離開，就是不自動離開，也慢慢被淘汰。」

惲代英在本次會議上經毛澤東提名，被增補為提案委員會委員。對這位比自己小兩歲的湖

北人（祖籍江蘇武進），毛澤東還是比較了解的，一九二四年他和惲代英等一起在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工作，具體來說是在做雜誌編輯。只是沒想到這個湖北佬的「火力」如此之猛。

毛澤東的發言則依舊是圍繞著農民問題，中心思想是要將農民運動合法化。他指出：「土豪劣紳，必須以革命手段處置之……和平辦法是不能推倒土豪劣紳的。」他希望成立有農民直接參與的革命法庭；他希望建立區鄉自治機關；他希望區鄉有自己的武裝；他希望廟產歸公……這些希望後來都變成了全國性的文件《農民宣言》和《農民問題決議案》。他希望在湖南以外的更大範圍傳播自己思想的目的，已開始逐步達到。

在閉幕會上，毛澤東根據「三二〇」事件，趁機提出「黃埔學生皆黨員，似不必有同志會之設立」。他這個溫和的提議，實際是針對蔣介石埋伏在軍校的私人組織——黃埔同學會。會議最後做出決定：「凡黨立各學校，不得有同志、同學、同鄉會之設立。」

接著，《統一領導機關案》、《軍事委員會組織大綱》、《統一外交決議案》、《統一財政決議案》、《統一革命勢力決議案》、《對全體黨員的訓令》、《對全國民眾宣言》等二十七個決議案都被一一表決通過。

幾乎所有決議案的矛頭都清晰地指向蔣介石，只是還沒有誰敢下決心徹底解決他。鮑羅廷暗中已試了幾次，甚至讓人給李宗仁送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大印，但李將軍謝絕了。事實上，沒有誰能在這個階段頂替蔣介石，也沒有誰有實力讓蔣介石下台。於是，在僵持之中，蔣介石仍

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軍事委員會委員、軍事委員會主席團成員、國民政府委員、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等，但蔣介石的兄弟盟友則是全面落選。

在那張著名的全會合影中，坐在正中的三個人分別是：孫中山的兒子孫科、孫中山的夫人宋慶齡、孫中山的小舅子宋子文。毛澤東站在第二排，他前面是外交部長，一句中文也不會講的陳友仁，他的後面是站在凳子上、很器重他的鄧演達。

正在回國路上的汪精衛，獲得了黨、政、軍三方面的高票，兵不血刃地從蔣介石手中奪回黨政最高權力，成為國民黨武漢政府的首腦。

在聯合政府各部裡，農民運動專家毛澤東沒有任何職務，另一位共產黨人譚平山卻出任武漢民國政府農業部長。恐怕在大部分國共兩黨掌權者的眼裡，毛澤東僅是一名候補委員而已，沒什麼分量。他僅是個發言者，而非決策者。

鮑羅廷、陳獨秀等人沒有看重毛澤東，而曾十分迷信陳獨秀和共產國際的毛澤東，也開始在思想上與這些人漸行漸遠。

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三月五日在中共湖南區委機關刊物《戰士》週刊發表了。接著三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嚮導》發表了報告的第一章和第二章的一、二節。這本是件高興的事，但毛澤東卻高興不起來。

他生氣地對楊開慧發牢騷：「考察報告的精華是後面幾章，可聽說中央要求《嚮導》停止

刊發。」

「為什麼？我看報告寫得很好。」楊開慧不解。

毛澤東看了看挺著大肚子的楊開慧，嘆口氣說：「那個受了共產國際教育的留學生，號稱是『莫斯科派』的彭述之對報告有意見。」

楊開慧問：「就是那個拆散向蔡同盟的彭述之？」

毛澤東點了根菸，深深地吸了一口，不屑地哼了一聲。

「趁蔡潤寰（蔡和森）去北京看病療養，就勾引向俊賢（向警予），這樣的人不是好人。」楊開慧氣憤地說。

毛澤東苦笑一下：「這個彭述之自命是風流才子，也是老頭子的應聲蟲。你說他不是好人？可他是中共中央的宣傳部長，有權呐。」

楊開慧問：「他們堅持不發表，怎麼辦？」

毛澤東的目光突然堅定起來，掐熄手中的菸，說：「真理是阻擋不住的。《戰士》不是發表了嗎，《民國日報》也要發表。這個報告已經在社會上有了反響，我堅信，反響還會不斷擴大。」

說完這番話，毛澤東陷入了沉思。六年前陳獨秀、李大釗相約南北建黨，他們那種「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狀態到哪裡去了？

《新青年》雜誌是毛澤東與陳獨秀結緣的媒介。一九一七年，正在湖南第一師範讀書的毛

澤東將自己寫的〈體育之研究〉投稿給《新青年》，結果這位年僅二十四歲的青年第一次在全國性的名刊上發表了文章。當他二十五歲在北大第一次見到比自己大十四歲的北大文科學長陳獨秀時，心情異常激動。雖然北大的精英們常常冷落他這位圖書管理員，可正是在北大的所見所聞使毛澤東覺醒，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者的方向發展，並且很快成了全國小有名氣的先進知識分子，引起了陳獨秀、李大釗等人的注意。後當陳獨秀因在北京街頭散發傳單被捕時，毛澤東在其主編的《湘江評論》創刊號上高呼：「我祝陳君萬歲！我祝陳君至堅至高的精神萬歲！」

一九二〇年八月，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剛成立，陳獨秀即給毛澤東寫信，約他在湖南做共產主義運動。在陳獨秀眼裡，湘人的奮鬥精神在毛澤東等一班可愛的青年身上復活了。而毛澤東正是在陳獨秀的共產主義思想一步步指導帶領下，才走出湖南，放眼中國。

在毛澤東的眼裡，陳獨秀不但是旗手，還是座標，是他在黑暗的中國放了一把火。五四以後，中國的文化與政治從右往左轉變，陳獨秀功不可沒。這個安徽人並不認為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是徹底的革命運動，也不認為在可見到的將來會有良好的議會制度，他認定馬克思主義才是解決中國問題的良方。

雖然陳獨秀看到了中國工業並不發達，一般工人談不上階級覺悟，也不能成為共產運動的骨幹，但他依然堅持工人人才是社會變革的關鍵。因為只有馬克思、列寧提出的歷史發展規律是從「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

一九二七年初的陳獨秀，感到了共產國際一味讓中國共產黨消融在國民黨之中的可疑之處，

開始失眠。各方就農運該走向何方這問題上無法達成一致，而他也毫無辦法，找不到出路。只能對指手畫腳的共產國際代表發發脾氣，而無決策權。因為他領導的黨不得不從莫斯科獲得主要經費，且須按時報帳。這位創立過五四獨立精神的人，卻把他創立的共產黨帶向「獨立」的對面。

在農民問題上，他更是實行家長制，認為「過火」的農民運動不合於科學的馬克思主義。他根本沒有看到、也沒想過在農村會驟集起足以推翻一個舊世界的巨大能量，他始終堅持暴動應該在城市展開。

上一年底以來，在上海搞了兩次工人武裝起義都相繼失敗。陳獨秀決定親自坐鎮，準備利用北伐軍進攻上海的可利形勢，搞第三次罷工起義。

而毛澤東並不認為在城市暴動會取得成功，他明顯的感覺是：陳獨秀在對他關於農民的論斷進行打壓。毛澤東自言自語：中國推翻帝制的革命先於蘇俄七年，可現在由上到下竟唯蘇俄之命是從。何日中國共產黨才能不再是共產國際的支部？

這一切都取決於獨立，只有獨立才能自主。在他的腦海裡又回想起第一次看到《共產黨宣言》時的思考，當時他恍然大悟，原來「階級鬥爭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而有社會就有階級鬥爭。再後來又說了考茨基的《階級鬥爭》，這位社會主義理論的權威更是把階級鬥爭進行了透徹的闡述。當下中國，工人階級與城市資產階級的矛盾還沒有農民與地主的矛盾尖銳。而階級鬥爭應該在占國家大多數的人群中進行，方可立竿見影。

當初陳獨秀認為三民主義非徹底革命不可時，毛澤東是贊同的。因為孫中山說：中國只有大

貧小貧之分，不適合階級鬥爭學說。而共產黨人走的就是階級鬥爭的道路。只是鬥爭應該從什麼地方點燃？從軍事上說，中國的軍隊都掌握在蔣介石和北方軍閥手中；從政治上說，北京政府和剛剛成立的武漢政府也不在共產黨手中。怎麼辦？陳大教授究竟是如何想的？僅僅靠知識青年，認為他們集合起來能成事，顯然太過片面。

此刻，毛澤東還不知道，自己將會成為陳獨秀創建的這個黨的繼承人，並和這位導師一樣，成為中國共產黨歷史上連任五屆的領袖（陳獨秀為一大至五大的黨內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為六大後期至十大的黨內最高領導人）。

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後，毛澤東除了農講所的日常工作和一些應酬外，最大的事是參與準備全國農協臨時執行委員會。

三月二十八日，他以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委員的身分，出席了中央農民部所召集有各省農運負責人參加的全國農民協會籌備會議。會議決定成立由湘、鄂、贛、粵四省的農協負責人組成全國農協臨時執委會，並準備全國農民代表大會。鄧演達、毛澤東等十三人為委員，鄧演達、譚延闓、陸沉、毛澤東、譚平山為常務委員，毛澤東兼組織部長。

當組織部長的最重要工作是網羅人才，他想到了——一個湖南老鄉——益陽人周谷城。

六年前，毛澤東在母校湖南第一師範學院附小做主事，認識了從北京高等師範學校畢業回鄉的周谷城。兩人一聊天，居然兩人師出同門，都受教於楊昌濟。當周谷城知道毛澤東已娶楊先

生的千金為妻時，連連恭喜。一年前，毛澤東在廣州主持第六屆農講所時，曾勸周谷城留下做農講所的老師未果；如今聽說周谷城在武漢軍委總政治部工作，他二顧茅廬。

當毛澤東在長江邊奧略樓下司門口斗級營的一間名為「一枝棲」的小旅館裡見到周谷城時，吃驚地問：「為什麼要住在這樣一個旅館？」周谷城回答：「便宜，一天只要一角錢。」毛澤東環顧四周笑道：「莊子在《逍遙游》中說：鶴鷄巢於深林，不過一枝。」

周谷城也笑道：「一枝棲，一枝之棲也。去年沒棲在你主管的農講所，還望見諒。」

毛澤東哈哈一笑，擺擺手說：「我是二顧茅廬。聽說你不願意去戰地農民委員會，我來動員你到全國農協工作，我是那裡的組織部長，你來也算是幫我的忙。」

當周谷城問毛澤東與鄧演達的關係時，毛澤東用感激的口吻說：「鄧擇生是個好人，雖然常常把『矛盾』二字掛在嘴邊，說明他看問題能看到本質，我很喜歡他。」

周谷城開始有些擔心總政治部歸鄧演達管，全國農協和農講所也歸鄧演達管，自己這麼跳來跳去不好。當他知道毛鄧二人之關係時，便爽快地答應去全國農協工作。

三月三十日，周谷城便到全國農協上班，負責起草文件和宣傳鼓動工作。遺憾的是，這個組織實際只生存了幾個月（全國農民代表大會因國共合作破裂而夭折，全國農協臨時執委會也因鄧演達等高升武漢而不了了之）。周谷城後來因厭惡戰爭，退出了革命隊伍，成為復旦大學的教授，繼而成為歷史學大師。

在周谷城上班的第二天，戊戌變法的創導者、政治家、思想家、一代大師廣東人康有為在

山東青島福山路六號七竅流血而死，他的死是近代史之謎。毛澤東在十八歲時的政治主張就是：由康有為出任中國國務總理。

在毛澤東忙於講課、開會的過程中，傳來一個對他個人而言的好消息：中共中央執行委員、中央局成員瞿秋白來武漢了。

對這位比自己小六歲的江蘇常州人，毛澤東一直稱為「瞿老師」。因為他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學中國班當過教員，後又在上海大學做過教務長。兩個人也算得上是老相識，在一九二三年的中共三大上就有過默契，毛澤東那時便提出了農民革命運動的重要性。當時負責起草黨綱草案的瞿秋白把這方面的內容寫進了草案：「國民革命不得農民參與，也難成功。」在後來的多次公開報告中，瞿秋白關於土地革命和武裝農民的主張與毛澤東的思考異曲同工。而這位黨內最熱情洋溢、又最旗幟鮮明地支持農民運動的領導人已經讀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據說他拍案叫好。

此刻的中共中央尚在上海，共產國際代表對駐漢口的中共中央臨時委員會不滿，要讓瞿秋白主事，正醞釀召開聯席會議。而新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駐華首席代表羅易也很快就要來武漢指導中共五大。毛澤東想，這會不會使自己的關於中國農民運動的觀點得到認同呢？

果然不出毛澤東所料。瞿秋白看完〈考察報告〉後立刻要求彭述之在《嚮導》上繼續刊登，但遭到彭述之的堅決拒絕。瞿秋白氣憤地說：「這樣的文章都不敢登，還想革什麼命。」他對妻

子楊之華說：「這是篇好文章，人人都應該讀幾次，你必須讀。」

很快，毛澤東從弟弟毛澤民那裡得知，瞿秋白決定撤開上海，在武漢為這篇文章出版單行本，由長江書店發行。寫了十多年文章的毛澤東尚未出版過單行本，他強忍住內心的喜悅，更加努力地投入到講課、開會、發言中去。

四月四日這天，毛澤東忙了一整天。

這天是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開學典禮的日子，毛澤東為此做了好多天的準備。但很遺憾，他接到了過江去參加中共中央會議的通知，只能向鄧演達告假，缺席開學典禮。

上午的會議是聯席會議，主導者是四月二日到達武漢的共產國際代表、印度人羅易，參加會議的還有鮑羅廷、維經斯基等，這些人都對中共的決策具有決定性作用。中共中央委員和中共湖北區委委員有瞿秋白、譚平山、蔡和森、張國燾、彭述之、李立三、陳延年、毛澤東等。

會議輕而易舉地撤銷了中共中央駐漢口臨時委員會，取而代之的是成立聯席會議常務委員會，瞿秋白、譚平山、張國燾為常務委員。此時，雖然中共中央大多數委員及中央各機關部門負責人相繼抵漢，但總書記陳獨秀卻依舊在上海謀劃與剛從歐洲經蘇俄回到上海的汪精衛見面。這次會議的決議是在黨的最高領導人缺席情況下做出的。

會議決定，四月二十五日召開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羅易提出成立幾個委員會為五大準備材料，其中土地問題委員會由瞿秋白、毛澤東牽頭。

毛澤東很高興與這位和自己觀點一致的領導人共事。瞿秋白告訴他，已決定將《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改名為《湖南農民革命》出版單行本。瞿秋白說：「湖南農民靠自己的能力自發地奪取政權。他們為什麼要權？就是為了要得到土地。這種用自己的力量解脫自己的桎梏，難道不應該讚揚，並為他們歡呼嗎？」

毛澤東謙虛地說：「瞿老師，我很希望就農民問題與你交流。不解決土地問題，革命就將是空談。我準備在五大上提議用暴力沒收土地，然後廣泛地重新分配土地。」

瞿秋白高興地說：「好哇。我看羅易對鮑羅廷有意見，共產國際執委會的那個《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指出：目前中國民族革命運動的發展重點是土地革命。這與鮑羅廷認為的『沒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太激進了』的觀點相左。我們完全可以利用他們之間的分歧，提出我們的見解。」

毛澤東笑了，他為有這樣重量級人物支持而欣慰。對這位充滿激情卻說話溫和的新中央領導人，毛澤東是佩服的，而此人的婚姻觀也曾是黨內外人士津津樂道的話題。

一九二三年，二十四歲的瞿秋白從蘇俄歸國，在上海大學任教，同時給鮑羅廷做翻譯。第二年，他與自己的學生、二十歲的四川人王劍虹結婚。據傳這位王女士與好朋友蔣冰之（後改名叫丁玲）同時愛上了瞿秋白。因為這事，蔣小姐愴然離開上海去了北京。

七個月後，王劍虹因肺病去世。又過了四個月，瞿秋白與一位名叫楊之華的有夫之婦結婚了，那時他自己也變成了有嚴重肺病的病人了。不知他的肺病與王劍虹有無關係。那時，中國人把這種病稱之為「癆病」，是種非常讓人恐懼的傳染病。

楊之華也是瞿秋白的學生，結婚四年，生有一女。與瞿秋白戀愛後，決心與丈夫沈劍龍離婚。瞿、楊、沈三個人在沈家談判，而後瞿秋白又請沈楊二人去了自己的老家常州。在此過程中，三人達成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協議。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上海《民國日報》頭版並排刊出三條醒目啟事：楊之華與沈劍龍脫離夫妻關係；瞿秋白與楊之華結合；沈劍龍與瞿秋白宣布成為朋友。在瞿楊婚禮上，沈劍龍剃了個大光頭，禮盒上寫著「和尚獻花」四個大字。楊之華的父親拍著桌子大吼：今天離婚今天結婚，真不要臉！老丈人一直拒絕見瞿秋白這個女婿。

但瞿秋白絲毫不在意，他浪漫地找來一方壽山石，在上面篆刻了四個字：「秋之白華」。兩人名字被鐫刻在石，表示矢志不渝。楊之華不會再生育，瞿秋白便將她的女兒沈曉光改名為瞿獨伊，視為己出。

四月四日的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開學典禮雖是遲到的，卻很是隆重。在大門的牌匾上等著六個大字「剷除封建勢力」。事先，毛澤東已帶人在院內的操場上搭起一個主席台，主席台周圍插著彩旗、掛著標語。學員們穿著新發的制服、打著綁腿、喊著口號在操場上整隊集合。

下午一時三十分，百餘名各界代表齊聚武昌紅巷十三號，不但有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的代表，還有太平洋勞動會議代表。人群中有法國人、美國人和英國人。

開學典禮由鄧演達親自主持，他高聲說：「求官和求學這是一個矛盾。參加農講所的學員

不是為求官而來，而是為求學而來，要練習革命的能力技術。」他號召全體學員：「農民向來是要回到農間去的。我們要穿著破衣服、髒衣服，帶著蟲子去爭鬥，以求卸去我們的髒破衣服，解決這個矛盾，得到我們應得的一切……」

就在半個月前，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剛閉幕，蔣介石派曾擴情帶著他的親筆信到武漢找鄧演達，邀請他出任總司令部參謀長。信中說：「十年來患難相從，值茲北伐之際，中道糾紛，形成分裂，言之痛心。苟望吾弟力挽狂瀾，共謀團結。」曾擴情是黃埔軍校政治部秘書，鄧演達的部下。但他鐵羽而歸，鄧明確表示：「道不同，不相為謀。」

鄧演達講完後，周以栗向大家報告了農講習所成立的經過。在各界代表都講完後，學員代表講話。來自廣東海豐的學員說到：「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是帝國主義的走狗。我們做農民工作的應該成為農民朋友的走狗。」事後，毛澤東知道了這話，哈哈大笑說：「我們給農民當走狗，這話很新鮮，也很深刻。農民革命的情緒高漲起來後，走狗衝鋒在前，槍手緊跟在後。有農會撐腰，貧苦農民就敢在太歲頭上動土囉。」

當時在台下觀禮的有一位叫張文秋的青年，是湖北京山縣的中共婦女部長。二十四歲的她正與北伐軍第十一軍政治部的共產黨員劉謙初戀愛，她也將代表京山縣委出席中共五大。

典禮結束後的一天，劉謙初把張文秋介紹給了剛講完課的毛澤東。張文秋對這位瘦高個、語言幽默的農民運動專家很有好感，當她得知毛澤東與夫人就住在離紅巷十三號不遠的都府堤時，便提出要去他家玩。

毛澤東笑著說：「熱烈歡迎。但現在不行，我的夫人正在醫院生孩子。」

張文秋一聽就著急了，說：「女人生娃兒就像過鬼門關，你還不快回去守著。」

毛澤東看看劉謙初，依舊笑著說：「沒想到哇，你這個女朋友還是個女權主義者。開慧已經是有兩個孩子的媽，生孩子的事她比我更有經驗。我忙，去不了，就是去了，也幫不上忙。這樣的事，等你有經驗了就不會大驚小怪囉。」

張文秋看了看劉謙初，不好意思地笑了。又問：「你的兩個孩子是男孩還是女孩？」

毛澤東聽了這話，樣子霎時變得慈祥起來，有些自豪地說：「都是男孩，大的叫岸英，五歲，小的叫岸青，三歲。」

張文秋脫口而出：「那這次應該生小女娃了。」

毛澤東樂了，說：「生男生女天註定，這不是可以通過革命來決定的呀！」

四月八日，毛澤東在參加完國民黨中常會第六次擴大會後，趕到醫院看已生完孩子四天的楊開慧。

一進病房，他就內疚地對楊開慧說：「實在太忙，霞姑，對不起囉。」楊開慧看著丈夫，兩眼閃著幸福的光芒，打趣地說：「生孩子，你在這裡我要生，你不在這裡我也要生。放心吧，孫嫂照顧得好。」

孫嫂抱著出生四天的孩子給毛澤東看。他興奮地接過孩子，目光久久停留在孩子粉紅色的

臉上，說：「你這個毛毛來的是時候，我那邊剛剛舉行開學典禮，你這邊就來到人間。看來一切都有好的開始。」

楊開慧說：「潤之，岸英剛出世你就給他取了名字。毛毛出生四天了，還冒得名字。」

毛澤東把目光從孩子臉上移開，看看楊開慧說：「你莫急，這幾天連著開會討論問題。可是我的腦子還是開了小差，老想著要給他取個名字。」

孫嫂從毛澤東懷中抱過孩子說：「先生識文斷字，起名字一定不會錯。」

毛澤東看看孫嫂手中的孩子，慢慢說道：「毛家的孩子都是按族譜取名字的。他們這一輩是遠字輩，岸英叫毛遠仁，岸青叫毛遠義。這三子生長江邊，近水者智，就叫毛遠智吧。古往今來，天下做父母的都望子成龍，我毛潤之也是個吃五穀的人，當然也望子成龍嘛。跟他兩個哥哥一樣，也取個字，就叫岸龍。你們看怎麼樣呀？」

楊開慧高興地說：「好哇，我們三孩子有名字囉。岸英、岸青、岸龍，遠仁、遠義、遠智三兄弟的名字都很好。」

毛澤東又與楊開慧聊起張文秋。楊開慧熱情地要毛澤東邀請張文秋來家裡玩。

楊開慧出院後，張文秋果然常到都府堤四十一號來玩。楊開慧打趣地對她說：「快結婚吧。

要是你生了女毛毛，就給我們家岸英當老婆。」

張文秋紅著臉說：「好啊。到時候你可別反悔。我喜歡你的這幾個孩子。」誰知一語成讖。

多年後，她們之間的約定竟真的成為現實。過了七年，張文秋與劉謙初生下了女兒劉思齊。女兒剛滿月，劉謙初就犧牲了。又過了七年，她與第二任丈夫陳振亞結婚，於一九三八年十月生下第二小女兒張少華。當時間指向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五日時，劉思齊與毛岸英在北京南海菊香書屋的西房舉行了婚禮。這時，楊開慧已被殺害了十九年。在楊開慧犧牲三十週年時，張少華（韶華）又與毛岸青結為伉儷。

毛澤東繼續早出晚歸。除了連續參加中共聯席會議外，還連續出席鄧演達主持的國民黨中央土地委員會會議。在委員會會議以及擴大會上，他不但擔任記錄，還往往是中心發言人。他的主要觀點是，「中國土地問題的解決，應先有事實，然後再用法律去承認」，即「不破不立」、「先斬後奏」的觀點。但在奪取土地的方式上，大家依舊分歧較大。

對於從上海傳來的〈汪精衛陳獨秀聯合宣言〉，在毛澤東看來是典型的妥協，目前的危機絕非用和平方法克服得了的。他納悶，為什麼去年把「革命」、「血色」、「不許」作為文章基礎的陳仲甫今天卻如此怯弱？他希望寄託在汪精衛身上太值得懷疑。汪氏不久前還指責毛澤東在湖南的活動是煽動叛亂，可他遠在國外，又如何知道中國農村的真實情況？沒有調查就亂發言，典型的偏聽偏信。

毛澤東並不知道上海發生了什麼，也不知道在陳究竟為什麼要發表宣言。只好把自己的希望寄託在中共五大，寄託在他信任的瞿秋白身上。

這天，瞿秋白忙完了白天的事，端坐在武昌三教街三十三號的寓所書桌前，動筆寫一篇他認為非常重要的文章。妻子楊之華泡好了他愛喝的紅茶，並在茶裡加了糖。

寫這篇文章一半是由於革命的需要，一半是由於憤怒。此前他已寫好了〈反對彭述之主義〉的文章，他不能原諒把持著中央宣傳部門的人如此對待毛澤東那篇極具現實意義的考察報告。他決定用自己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功底，分析當下農民問題、土地問題，進而提升考察報告的政治理論含量。

瞿秋白提筆寫下標題〈湖南農民革命序〉。開篇一句就點到了中國農民問題的穴位上：「『匪徒、惰農、痞子』這些都是反動的紳士謾罵農民協會的稱號。但是真正能解放中國的卻正是這些『匪徒』……」

然後他開始用感性的語言分析「土匪」、「官僚」、「土匪頭兒」之間的關係，目的是提高農民對土地問題的認識。他想用如此語言告訴掌權者們：對農民問題的認識不能停留在一般、理論、原則的層面上，必須直接面對鮮活的農民運動。

他寫道：「農民打倒官權、神權、族權、男權是為著什麼？為著創造自己的民權……民眾已經開始自己管理自己的事，甚至打官、交錢糧、減租、阻穀、辦學堂、興水利……都是自己來管。」「農民沒有土地，便是如魚失水。農民要一個國家，他們對於自己的國家，當然願意納稅。但是，第一，他們必須自己來創造這個國家；第二，他們的國家不許有土豪劣紳私有田地。」「中

國境內，沒有一個農民納什麼地主的租；農民只能租國家的田，不能承認『不自耕作、坐收田租』的人。這就叫土地國有。」

寫到這兒，瞿秋白愈感到，徹底解決農民問題和土地問題才是所有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中的根本問題，而無產階級的盟友就是農民。他激動地寫道：

「中國農民要的是政權，是土地。因為他們要這些應得的東西，便說他們是『匪徒』。這種話是什麼人說的話！這不但必定是反革命，甚至於不是人！」「中國農民要動手了，湖南不過是開始罷了！」「中國的革命者個個都應當讀一讀毛澤東的這本書，和讀彭湃的《海豐農民運動》一樣。」

在瞿秋白的眼裡，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應該成為指導全國農民革命運動的綱領性文件。此前，他已經對考察報告做了修改，還調整了部分段落，增加了表格，使之更加完整清晰。

瞿秋白寫完這篇兩千字的檄文，時鐘已指向了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凌晨兩點。他不知道，就在一個時間，離武漢千里之外的上海，以杜月笙、張嘯林為首的中華共進會四百餘人，開始襲擊上海工人糾察隊的各個據點。而正是瞿秋白在寫序之時，上海市總工會委員長汪壽華被杜月笙誘捕，活埋在龍華的荒野之中。

瞿秋白在序中說：「中國農民要動手了。」可蔣介石沒等農民動手，便給了武漢政府以及陳獨秀、鮑羅廷等人當頭一棒，用武力方式宣告與武漢政府及共產黨的決裂。對於這次決裂，史

稱蔣介石「四一二政變」。

毛澤東沒料到分手來得這麼快、這麼迅猛、這麼殘酷。他亦沒料到，從此大量的生死存亡問題接踵而至。

